

具身视野下民俗活动的青少年身体实践

沈可轩

暨南大学人文学院, 广东 广州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11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19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30日

摘要

研究聚焦粤东潮汕地区民俗活动, 探讨青少年在传统仪式中的身体实践对文化认同的塑造机制。通过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 分析了抬轿巡游、锣鼓班等具身实践。研究发现, 青少年通过肌肉记忆, 将身体转化为责任和身份认同的隐喻; 仪式中的高强度身体互动在身体上留下痛感烙印, 促使个体将物理疼痛转化为文化认同的具身凭证; 锣鼓班的集体合作则强化了地方身份的表达。民俗活动通过“身体在场 - 感官沉浸 - 符号互动”的实践链条, 促进了青少年文化认同的生成。

关键词

民俗活动, 具身化理论, 青少年, 身体实践

The Physical Practice of Folk Activities by Teenagers from an Embodied Perspective

Kexuan Shen

School of Humanitie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Received: May 11, 2026; accepted: June 19, 2026; published: June 30, 2026

Abstract

The study focuses on folk practices in the Chaoshan region of Eastern Guangdong, exploring how adolescents' bodily engagement in traditional rituals shapes cultural identity. Through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s, it analyzes embodied practices such as sedan-chair parades and gong-and-drum ensemble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adolescents transform their bodies into metaphors for responsibility and identity through muscle memory; intense physical interactions during rituals leave sensory imprints of pain, prompting individuals to convert physical discomfort into embodied proof of cultural belonging; collective collaboration in gong-and-drum performances further strengthens expressions of local identity. Folk activities foster adolescent cultural identity

formation through a chain of practice involving “bodily presence-sensory immersion-symbolic interaction”.

Keywords

Folk Activities, Embodiment Theory, Teenagers, Bodily Practic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城乡空间结构的重组、教育与就业导向的生活节奏，以及媒体与消费文化的持续渗透，正在改变地方社会中代际互动与文化再生产的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民俗活动并非简单走向“消退”或“保留”的二分结局：一方面，仪式性实践仍可能以社区动员、情感凝聚与象征秩序重申的方式维系其公共性；另一方面，参与者结构、组织逻辑与表现形态也会在现代生活制度的挤压下发生调适与重组。对于正处于身份建构关键期的青少年而言，民俗活动不仅是被观看的“传统”，更可能是一种在场参与的社会化过程。

潮汕文化，是东南沿海民间信仰与社区秩序紧密交织的代表性民俗实践。潮汕地区的民俗活动起源于古代民间信仰，通过抬神巡安和锣鼓仪仗等具身化仪式，构建了人神共生的精神空间。然而，从社会学视角看，若仅将其视为“文化符号”或“地方传统”，容易忽略仪式如何通过具体的互动情境与身体动员来生成秩序：谁能进入核心环节、如何被分配角色、身体如何被训练与规训、情绪与敬畏如何被组织出来，以及这些机制如何形塑青少年的主体经验与群体边界。

“具身”视角为理解上述机制提供了关键入口。与把身体当作仪式的“载体”不同，具身研究强调身体本身既是实践的场所，也是社会结构得以沉淀与再生产的重要媒介；身体的姿态、节律、队形、劳累与痛感、以及被观看与自我呈现的互动秩序，常常构成社会规范得以内化的路径。在此意义上，民俗活动不仅是地方文化的展示，更是一套通过身体技术与互动仪式链条生成共同体秩序的社会过程；青少年参与其中，既可能获得归属与荣誉，也可能经历角色分层所带来的压力与边界化。

基于此，本文以潮州市 S 村民俗活动为个案，通过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获取一手材料，聚焦青少年在仪式过程中的身体实践，尝试回答以下问题：第一，巡游与相关仪式环节中，青少年的身体技术如何被学习、评价与规范化，从而影响其行为认知与自我感受？第二，角色分配、队伍组织与现场互动如何塑造青少年的身份位置与群体边界？第三，在城市化与制度化生活节律的背景下，青少年的参与动机与意义阐释出现了哪些新变化，它们如何反过来影响仪式的当代表达与地方秩序的再生产？

2. 文献综述

具身视角最早可追溯至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对“身体-世界”关系的论述，现象学取向强调，身体是主体理解世界的起点，个体通过身体与环境的互动生成意义经验[1]。在此基础上，叶浩生对“具身”概念进行了系统辨析，指出具身并非仅指身体存在，而是强调认知、行动与环境之间的动态关联[2]。这一视角被进一步引入文化与社会研究领域。冯碧莹、宣朝庆从本土语境出发讨论具身化理论，指出身体经验在社会整合与文化认同形成中具有基础性意义[3]；李占伟则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出发，强调身体性是技艺、规范与文化意义得以延续的重要媒介[4]。这些研究共同揭示，身体并非文化的外在

载体，而是文化学习发生的关键场域。

在民俗学领域，研究逐渐从对仪式象征与文化意义的解释，转向对身体实践在民俗建构与传承中作用的关注。刘铁梁提出“身体民俗学”视角，强调民俗首先是一种通过身体经验被感知、被实践的生活过程[5]。王霄冰、禰颖系统梳理了身体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指出身体经验、参与观察与个体叙事是理解民俗实践的重要路径[6]。彭牧通过对西方民俗学身体研究的引介，进一步强调田野调查本身也是一种具身实践[7]。在具体经验研究中，不少学者以民俗体育与仪式活动为例，分析身体实践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倪军等通过对舞龙活动的研究指出，青年在反复的身体动作中逐渐内化文化观念，身体训练成为认知生成的重要途径[8]；相关研究亦从“体化实践”的角度，强调身体动作在社会记忆嵌入与仪式表达中的意义[9]。

聚焦潮汕地区的民俗活动，学界已从文化传统、社会功能与现代转型等方面展开研究。相关研究普遍认为，该仪式在维系宗族关系、强化社区凝聚力与建构地方认同方面具有重要作用[10][11]。从文化整体视角出发的研究指出，潮汕文化以宗族结构与民间信仰为重要支撑，其精神内核在仪式实践中得以延续[12][13]。在具体仪式研究中，学者开始关注民俗活动中的表演与感知层面。潘妍娜以游神活动为个案，分析了潮州大锣鼓在仪式氛围营造与文化表达中的作用[14]；谢峥悦、蒋夔进一步指出，大锣鼓表演通过情感动员，推动认同从宗族层面向更广泛的地域层面延展[15]。这些研究为理解民俗活动如何通过视听体验生成认同提供了重要线索。

从文化记忆与认同研究来看，学者普遍认为，民俗活动通过重复性的仪式实践，将历史经验转化为可感知的集体记忆，并在此基础上建构群体认同[16][17]。在民俗体育与节庆研究中，相关研究进一步指出，集体参与、象征符号与身体运动是价值认同与群体意识形成的重要机制[18]-[20]。针对青少年群体，也有研究从教育与社会化角度，讨论传统文化参与对其认同形成的意义[21]。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从具身理论、身体民俗学以及潮汕地区习俗等多个层面，为理解民俗活动的文化意义提供了重要启示，但在以下方面仍存在不足：其一，青少年往往被视为“参与群体”，而非具有独立经验与学习路径的分析主体；其二，身体实践在认同生成中的作用多被原则性肯定，缺乏对具体实践机制的细致描绘；其三，对该地区民俗活动的研究尚未充分结合青少年社会化过程展开。因此，本文以潮州市 S 村民俗活动为个案，在具身视角下，通过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分析青少年在抬轿、锣鼓表演等仪式实践中的身体经验。

本文所探讨的青少年民俗文化认同，是多层次、多维度叠加形成的复合概念，并非单一的情感偏好，具体可划分为三个递进且交融的层面：其一为家族社群层面的认同，指向青少年对家户参与义务、家族仪式荣耀及房支社群联结的价值认可；其二为村居地方层面的认同，体现为对本村礼俗秩序、邻里人情网络与乡土生活方式的情感归属；其三为地域文化层面的认同，是对潮汕整体民俗文化特质、在地文化符号与区域身份标识的整体接纳与认同。三个层面并非相互割裂，而是经由持续的身体实践不断渗透、叠加、共生，共同构成青少年文化认同的完整体系。

3. 研究方法

3.1. 个案选择与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广东省潮汕地区潮州市 S 村为个案，对农村青少年参与民俗活动的身体实践进行深入分析。选择 S 村作为研究场域，主要基于其习俗保存较为完整，且活动组织具有明确的社区结构和稳定的参与机制，能够较为集中地呈现地方民俗仪式中身体实践的运作方式。

S 村为单一姓氏村落，村庄内部社会关系紧密，宗族与理事会在公共事务中仍发挥重要作用。民俗活动由村中老人理事会统筹组织，并通过公告与微信群等方式动员村民参与，形成覆盖全体村民的仪式网

络。青少年在该活动中普遍参与锣鼓表演、扛兵器及巡游等环节，是仪式运作中不可或缺的行动主体。这一结构性位置使其成为观察地方文化如何通过身体实践实现代际传递的重要对象。

3.2. 田野调查与数据收集

3.2.1. 参与观察法

研究者于 2024 年与 2025 年 S 村元宵节活动期间进入田野场域，参与并观察仪式筹备、巡游及相关祭祀活动的全过程。在田野调查中，研究者以参与式观察的方式跟随仪式队伍，重点记录青少年在不同仪式环节中的身体行动、队形安排、互动方式及其与长辈、同伴之间的协作关系。通过现场笔记与即时记录，捕捉身体动作、情绪表达及互动情境中所蕴含的社会规范与象征意义。

3.2.2. 半结构式访谈

本研究共访谈 18 位受访者，其中青少年 16 人(男生 9 人、女生 7 人)，访谈对象主要集中于中学阶段，涵盖民俗活动中的不同身体角色，包括扛轿、扛兵器及锣鼓班表演等；同时访谈了 2 位村级组织者(理事会会长与 C 祠堂负责人)，以补充对仪式组织逻辑与角色分配机制的理解。考虑到研究对象中包含未成年人，访谈过程中遵循知情同意原则，并在论文写作中对所有受访者信息进行匿名与模糊化处理(见表 1)。

Table 1. Interviewee's basic information

表 1.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编号	身份类型	性别	年龄/学段	主要参与角色	备注
A1	青少年	男	初中	扛轿	本村常住
A2	青少年	男	初中	扛轿	本村常住
A3	青少年	男	初中	扛兵器	本村常住
A4	青少年	男	初中	扛轿	节日期间返乡
A5	青少年	男	初中	扛兵器	本村常住
A6	青少年	男	初中	扛轿	本村常住
A7	青少年	男	小学	扛兵器	本村常住
A8	青少年	男	小学	扛兵器	节日期间返乡
A9	青少年	男	中学	扛轿	本村常住
A10	青少年	女	初中	锣鼓班(敲锣)	本村常住
A11	青少年	女	初中	锣鼓班(敲锣)	本村常住
A12	青少年	女	初中	锣鼓班(敲锣)	本村常住
A13	青少年	女	初中	锣鼓班(敲锣)	本村常住
A14	青少年	女	初中	锣鼓班(敲锣)	节日期间返乡
A15	青少年	女	初中	锣鼓班(敲锣)	本村常住
A16	青少年	女	小学	锣鼓班(敲锣)	本村常住
B1	村级组织者	男	老年	理事会会长	负责仪式统筹
B2	村级组织者	男	老年	C 祠堂负责人	协调组织事务

3.3. 数据整理与分析

研究所得资料包括参与观察记录与访谈文本，采用质性分析方法进行处理。研究者在 Nvivo 软件辅助下，结合人工反复比对，对文本资料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与选择性编码，逐步归纳出与青少年身体实践、仪式规训及身份建构相关的主题范畴。在分析过程中，注重不同资料来源之间的相互印证，以提升研究结论的解释力与可信度。

4. 仪式中的身体实践

4.1. 身体协作与责任分配：抬轿中的角色学习

潮汕地区民俗活动中巡游的路线设计并非随意安排，而是深植于宗族历史、村居边界与神圣空间的文化逻辑之中。以 S 村为例，游神队伍多沿村界巡游，路径穿行于田埂、古巷、祠堂等富有历史与象征意义的空间。青少年在这一过程中并非被动随行，而是被安排进入抬轿、护卫等需要持续身体投入的环节。

抬轿对身体协作提出了高度要求。面对体量较大的神像，参与者需要在行进中保持步伐一致、重心平衡，并根据路况与锣鼓节奏不断调整身体状态。这种协调很少通过明确的语言指令完成，而更多依赖身体之间的即时感知与反复磨合。A2 在访谈中提到，起初抬轿时“总觉得不稳”，但“走久了，大家自然就会配合上”。在一次巡游过程中，当队伍行至村中一处狭窄巷道时，由于前后步伐节奏不一，神轿出现明显倾斜，队伍被迫短暂停下。一位年长的抬轿者并未直接出声指责，而是走到队伍前方，用手势示意大家重新调整站位，并反复提醒“跟着鼓点走”。短暂调整后，队伍重新出发，步伐明显趋于一致。几位参与的青少年在事后提到，这类“被停下来重新来过”的经历，比单纯的讲解更让他们意识到配合的重要性。

这种身体协作并非孤立发生，而是嵌入具体的家庭与宗族关系之中。S 村为单一姓氏村落，宗族网络在公共事务中仍具有显著影响力。在民俗活动中，抬轿往往由同一家庭或房支成员共同承担，父辈与青少年并肩参与，使身体劳动同时成为代际互动的场域。受访者 A1 回忆与父亲一同抬轿的经历时表示，父亲在行进过程中不断提醒如何用力、如何配合，“感觉是在一起完成一件很重要的事”。

在角色分配上，抬轿人选通过抓阄方式产生，确定户主的名字之后，各个家庭成员都可以代表家庭履行宗族责任。对青少年而言，这种看似偶然的安排被普遍理解为村庄大事，从而削弱了个人选择的意味。多位受访者提到，即便体力消耗较大，也很少产生抱怨情绪，因为“能抬到老爷是一种荣耀”。在这一过程中，身体付出被赋予道德含义，抬轿不再只是体力劳动，而逐渐成为一种被期待承担的责任。

4.2. 节奏训练与情感同步：锣鼓表演的集体化机制

相较于抬轿，锣鼓表演对身体的要求更多体现在节奏控制与持续训练之中。在 S 村，民俗活动期间的锣鼓班主要由青少年组成，并呈现出相对稳定的性别分工：敲锣者多为女生，铙钹则由男生负责。锣鼓班成员通常在正月初九前后开始集中练习，反复熟悉固定节奏，为巡游中的连续演奏做准备。

锣鼓演奏依赖身体记忆的形成。多位青少年提到，最初需要“看着节奏点打”，但在多次训练后，“手会自己跟着节奏走”。这种从有意识控制到身体自动反应的转变，使节奏逐渐内化为身体的一部分。节奏的稳定不仅关乎个人表现，更直接影响整体演奏效果，因此每位成员都需不断调整自身状态，以适应集体节奏。在巡游现场，锣鼓声构成了一种持续的声音环境。声音在空间中扩散，为队伍划定存在边界，也在听觉层面制造出强烈的在场感。A14 形容道：“锣鼓一响起来，人就会跟着兴奋，好像整个人都被带进去了。”在持续的节奏中，演奏者与周围参与者逐渐进入同步状态，身体感受与情绪体验相互

感染，形成集体性的情感氛围。

锣鼓技艺的学习往往伴随着代际传递。部分青少年由家中长辈引入锣鼓班，在练习过程中接受动作示范与节奏指导。正如受访者 A11 所言：“小时候就是在旁边看，慢慢就会被安排上场。”在这一过程中，身体训练不仅传递演奏技巧，也传递对仪式参与价值的理解，使青少年在节奏同步中逐渐融入集体。

4.3. 疼痛、忍耐与身体印记的仪式化意义

民俗活动中的仪式对身体耐力提出持续而具体的要求。以 S 村为例，巡游活动通常持续三天，自正月十四晚至正月十六日下午，每次行进时间长达数小时。2025 年元宵节期间，巡游恰逢连续降雨，队伍仍按既定时间完成全部流程。长时间负重行走、反复演奏以及湿滑路面，使身体疲劳与受伤成为难以避免的经验。

在仪式语境中，这些疼痛并未被简单理解为负面体验，而是被重新赋予意义。多位青少年在访谈中提到，肩膀酸痛、淤青甚至摔倒“都是正常的”，也是“真正参与过”的标志。A6 表示：“抬轿就是要吃苦。”身体疼痛由此被转化为责任履行与投入程度的象征。这种转化并非孤立发生，而是在集体互动中不断被确认。仪式结束后的休息时间，青少年常通过相互比较、调侃身体不适的方式交流经验。在这种共享叙述中，个体疼痛被纳入群体记忆，成为彼此认可的依据。A4 回忆起第一次参与后留下的水泡和疤痕时表示“反而觉得那是一个证明”。

这些身体印记并未被视为需要隐藏的缺陷，反而成为展示参与经历的象征。与此同时，正是通过对疼痛与忍耐的强调，仪式在无形中划定了参与的边界：谁能够坚持完成全程，谁中途退出，往往被默认为参与程度不同。身体在此不仅承受仪式，也记录并展示参与程度，使个体在行动与体验中逐渐确认自身位置。

4.4. 权力关系、性别分工与青少年多元参与动机

仪式场域中始终存在隐性的礼俗权力运作与人际压力，村内老年理事会与祠堂长辈掌握仪式统筹、角色分配、队伍调度与训练安排的主导权，青少年整体处于仪式参与的从属位置，其行为选择与身体实践始终受到乡土人情与长辈期待的潜在约束。部分青少年的参与并非完全源于主观兴趣与文化认同，而是出于家族颜面维系、邻里人情维系以及长辈期许的软性社会压力，在被动顺应礼俗安排中完成仪式身体任务。长辈较少采用硬性指令约束，更多依托现场手势示范、语气引导与群体评价等柔性方式，规训青少年的身体姿态、行进节律与行为举止，在非正式的礼俗权力浸润中，塑造个体的仪式行为规范与参与边界。

与此同时，民俗呈现出自然固化的性别分工特征，这种分工并非源于个体自由选择，而是地方乡土性别观念在民俗身体实践中的具象投射。男性青少年多承担抬神轿、扛兵器、铙钹演奏等负重性、护卫性体力任务，女性青少年则集中参与锣鼓班敲锣等节奏展演、氛围营造类环节，不同性别群体被归置到差异化的仪式身体角色之中。青少年在默认并适配这种性别分工的过程中，也同步潜移默化地习得在地化的性别角色认知，成为乡土社会性别观念代际传递的重要过程。

进一步来看，青少年对民俗仪式的参与并非单一的主动认同与全然接纳，而是呈现出顺从、认同、抵触与协商并存的多元复杂形态。部分青少年完全遵从家庭与社群安排，缺乏内在参与兴趣，仅按要求完成基础身体劳作，情感投入度较低；另有部分青少年由衷喜爱仪式氛围，珍视村居社群带来的荣誉感，主动参与前期排练、坚守全程巡游，在身体付出中收获强烈的乡土归属感；也有青少年难以承受仪式高强度的身心负荷，对刻板的角色分工心生抵触，出现训练敷衍、消极懈怠甚至萌生中途退出的想法；更多青少年则处于折中协商的状态，既认可乡土民俗的情感价值与社群意义，又对繁重的身体劳作、固化

的参与规则存有自身想法，通过结伴参与、自主调整身体节奏、简化非核心环节投入等方式，在顺应礼俗规范与坚守个人感受之间寻求平衡，展现出个体在民俗规训中的主观能动性与灵活调适空间。

5. 文化认同的生成机制

5.1. 身体记忆：重复动作中的无意识学习

在民俗活动仪式中，青少年的身体参与往往具有高度的重复性。无论是抬轿时的步伐配合，还是锣鼓演奏中的节奏练习，这些身体动作都需要在特定时间与情境中反复执行。正是这种重复，使身体逐渐形成稳定的动作模式和感知习惯，从而在不依赖语言说明的情况下完成学习过程。

多位青少年在访谈中提到，最初参与时需要依靠他人的提醒或模仿，但随着参与次数的增加，“身体会自己知道该怎么做”。这种转变并非源于明确的规则讲解，而是在持续实践中形成的身体记忆。抬轿时对重心的调整、行进中的步伐节奏，锣鼓演奏中对拍点与力度的把握，均在反复训练中内化为一种“不用想也会做”的身体反应。这种无意识的身体学习，使文化规范得以绕过显性的说教而被接受。青少年并非通过被告知“应当尊重传统”来形成认同，而是在身体习惯逐渐稳定的过程中，习得对仪式节奏、角色分工与行为边界的理解。身体在此不仅是执行动作的工具，更是文化知识得以沉淀的重要载体。

这种身体记忆并不完全中性。不同身体角色对应着不同的学习路径：抬轿者通过负重与协作学习责任与坚持，锣鼓成员则在节奏同步中学习配合与秩序。身体记忆的差异，进一步塑造了青少年对自身在仪式中位置的理解，也为文化认同的多样化形态提供了基础。

5.2. 情感共鸣：集体仪式激发的归属感

如果说身体记忆为认同提供了稳定的实践基础，那么情感共鸣则为认同赋予了情绪动力。在仪式中，情感并非个人内在体验，而是在集体行动中被不断激发与放大的。锣鼓声、巡游队伍、围观人群以及共同经历的劳累与兴奋，共同构成了一个高度情绪化的互动场域。

在这一场域中，个体情绪往往通过身体同步而被放大。当锣鼓节奏逐渐统一、队伍步伐趋于一致时，青少年不仅在行动上保持协调，也在情绪上进入相似状态。A5 与 A16 形容道，在锣鼓声最密集、巡游最热闹的时刻，“会不自觉地兴奋起来”“感觉自己是其中的一部分”。这种情绪并非来自对仪式意义的理性理解，而是源于身体与他人同步所带来的情感感染。此外，共同承受的身体压力也是情感共鸣的重要来源。长时间的行进、雨中的坚持以及身体不适，使参与者在仪式结束后产生一种“共同经历过”的感受。青少年在相互调侃、比较劳累程度的过程中，将个体体验转化为集体记忆，从而强化了彼此之间的联结。这种情感联结并不依赖正式的身份确认，却在互动中不断被确认与巩固。

通过反复参与，青少年逐渐将这种情感体验与民俗中的仪式联系起来。仪式由此不再只是某个时间节点的活动，而成为一种可以唤起归属感的情绪资源。当青少年在谈及仪式时使用“我们”“大家”这样的表述时，情感共鸣已经在无形中完成了对群体边界的建构。

常住于 S 村的青少年深度嵌入本村人情网络与社群生活，经由长期集体互动构建起稳固的乡土归属感，能够精准解读巡游路线、神轿仪仗、锣鼓展演等民俗符号背后庇佑村居、联结社群的深层内涵。返乡青少年常年在外交受现代教育、融入都市生活，与本村社群联结相对松散，仪式参与多停留在热闹氛围的浅层体验，难以真正融入乡土群体圈层，对民俗符号的理解也多流于表层观感，缺乏生活化的深层体悟。

5.3. 符号内化：传统元素的意义认知

在身体记忆与情感共鸣的基础上，青少年逐渐开始对仪式中的象征元素形成较为稳定的理解。神像、

神轿、锣鼓、巡游路线等原本可能显得抽象或陌生的符号，在反复参与中被赋予具体意义。这种意义的形成，并非源于系统化的解释，而是在实践与互动中逐渐被理解和接受。

研究对象在访谈中提到，最初参与民俗活动时，并不能清楚说明每一个环节的象征含义，但随着年龄增长与参与次数增加，“会慢慢知道这些东西代表什么”。例如，巡游路线被理解为“保佑整个村子”，抬轿被视为“替家里出力”，锣鼓声则被认为“是热闹、是请神的方式”。这些理解并不完全一致，却在总体上指向对地方文化秩序的认同。

符号的内化还通过长辈的解释与示范得以强化。在训练或仪式过程中，长辈往往以简短的话语提醒“要认真”“不能乱来”，并通过自身行为示范何为“合适的参与方式”。青少年在观察与模仿中，将这些行为与仪式符号联系起来，从而在实践中学习其象征意义。

符号内化并非一次性完成，而是一个渐进过程。只有在身体能够适应仪式节奏、情感能够融入集体氛围之后，象征意义才具有可理解的基础。正是在身体、情感与符号的层层叠加中，民俗活动逐渐从外在的传统活动转化为青少年理解地方文化、确认自身归属的重要框架。

6.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潮汕地区 S 村民俗活动为研究个案，在具身视角下考察青少年在仪式参与过程中的身体实践及其文化认同生成机制。通过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文章重点分析了抬轿、锣鼓表演与巡游等身体实践如何在具体情境中被组织、体验与解释，并进一步探讨这些经验如何转化为青少年对地方文化的认同。

研究发现，青少年在民俗活动中的参与并非停留在象征层面，而是通过高度具体、持续投入的身体实践被纳入地方秩序之中。抬轿等身体协作实践，将个体身体嵌入家庭与宗族责任网络，使青少年在行动中学习如何承担责任与配合他人；锣鼓演奏中的节奏训练与同步行动，则通过身体记忆与情感感染，促成参与者之间的情绪联结与集体在场感；而在长时间巡游与高强度投入中产生的疼痛与身体印记，则在仪式语境中被重新赋义，成为确认参与资格与区分群体边界的重要标志。身体在这一过程中不只是承载仪式的工具，而是意义生成与秩序内化的关键媒介。

进一步来看，文化认同并非在仪式参与中自然、即时地产生，而是经历了由身体体验到意义理解的渐进过程。通过反复实践形成的身体记忆，使青少年在无意识层面习得仪式规范与角色边界；在集体行动中激发的情感共鸣，则为认同提供了情绪动力；在此基础上，神像、锣鼓、巡游路线等象征元素逐渐被理解为与自身生活经验相关的文化符号。正是在身体、情感与符号不断叠加的过程中，民俗活动成为青少年理解地方文化、确认自身归属的重要框架。

本研究以潮汕单一姓氏宗族型村落 S 村为田野个案，村落内部地缘、血缘高度重合，人情网络与民俗动员具有强凝聚性，这一特殊社会背景使得青少年身体实践、角色分配与认同建构带有单姓村落的专属特征。受个案样本限制，研究结论难以直接推广至多姓氏杂居村落、城乡结合部及城市社区的同类型民俗活动。本研究仅聚焦元宵节单一时段仪式参与，且样本以中小学未成年群体为主，年龄层次与社会阅历覆盖面有限。

未来研究可引入多姓氏村落、城市回迁社区、外来人口混居社区作为比较案例，对比不同社群结构下青少年身体实践的差异；亦可拉长研究时间维度，追踪青少年升学、务工流动后的民俗参与行为与文化认同演变，进一步检验本研究“身体在场 - 感官沉浸 - 符号互动”实践链条的普适性。

参考文献

- [1] 莫里斯·梅洛-庞蒂. 知觉现象学[M]. 姜志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 [2] 叶浩生. “具身”涵义的理论辨析[J]. 心理学报, 2014, 46(7): 1032-1042.

- [3] 冯碧莹, 宣朝庆. “通国身”: “具身化”理论的本土想象[J]. 社会, 2023, 43(4): 40-71.
- [4] 李占伟.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身体性[J]. 新乡学院学报, 2018, 35(2): 73-76.
- [5] 刘铁梁. 身体民俗学视角下的个人叙事——以中国春节为例[J]. 民俗研究, 2015(2): 5-11.
- [6] 王霄冰, 禰颖. 身体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J]. 文化遗产, 2019(2): 66-76.
- [7] 彭牧. 民俗与身体——美国民俗学的身体研究[J]. 民俗研究, 2010(3): 16-32.
- [8] 倪军, 管军, 杨淑梅, 等. 青年群体传承民俗体育文化的行为逻辑——基于闽西灵地村舞龙的分析与讨论[J]. 体育科学, 2024, 44(2): 77-87.
- [9] 李翠含, 吕韶钧. 体化实践: 民俗体育的身体经验[C]//中国体育科学学会. 第十二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论文摘要汇编——专题报告(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分会).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 2022: 472-473.
- [10] 陈友义. 潮汕“营老爷”习俗及其文化审视[J].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 28(3): 31-36+94-95.
- [11] 王素涛, 刘海容. 引领民间祭祀文化助力乡村振兴——以潮汕盐灶村营老爷为例[J]. 特区经济, 2022(11): 121-125.
- [12] 杨晓英. 论潮汕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独特性[J].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4, 25(3): 74-79.
- [13] 陈晓东, 适庐. 潮汕文化精神[M].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1: 137-139+134.
- [14] 潘妍娜. 民俗“迎老爷”中潮州大锣鼓存在现状考察与文化解读——以潮州市两个社区的游神活动为个案[J]. 歌海, 2016(1): 117-120+126.
- [15] 谢峥悦, 蒋燮. 从宗族认同到地域认同: “迎老爷”仪式中的潮州大锣鼓音乐研究[J]. 艺术探索, 2024, 38(1): 98-103.
- [16] 周阳. 社会记忆视域下“非遗”文化资本的再生产——以“秦淮灯彩”为例[J]. 民族艺术, 2021(5): 108-118.
- [17] 赵爱霞, 左路平. 论文化记忆及其意识形态功能[J]. 思想教育研究, 2022(2): 80-86.
- [18] 郭娟. 祖先崇拜与中华传统民俗体育活动的价值认同研究——基于传统龙舟竞技仪式的分析[J]. 体育与科学, 2023, 44(4): 95-100.
- [19] 孟林盛, 乔恩东, 李慧贤, 等. 村落民俗体育的文化生态适应与当代发展——基于下董寨村“跑马排”春节习俗的田野调查[J]. 体育与科学, 2021, 42(3): 26-34.
- [20] 张继生, 刘冬, 彭响, 等. 隐喻·交融·枢纽: 民俗体育活动仪式中的象征符号功能表征——以罗锦社龙舟竞渡为个案[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21, 55(1): 33-39.
- [21] 赵晓霞. 文化记忆视角下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的路径与策略[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6(2): 112-118.